

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八輯

(行发部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地质印刷厂印刷
(北京安德路4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1/32·8 5/8 印张·190,000字

1964年9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4,201—58,100 定价: 0.90元

统一书号: 11224·30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二、本選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	程 潜 (1)
反袁回忆录	何 遂 (53)
我在反袁护国期間的经历	张 鈺 (65)
中华革命軍山东討袁始末	鍾 冰 (83)
中华革命軍山东反袁战争亲历記	辜仁发 (118)
二次革命失敗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	楊思义 (124)
湯薌銘在湘暴行及筹备帝制紀实	涂竹居 (140)
袁世凱挟制熊希齡解散国民党的经过	郑廷璽遺稿 (151)
旧海軍南下护法及北归紀略	胡文瀾 袁方乔 (154)
政学会的政治活动	韓玉辰 (176)
我所知道的徐世昌	张达驥 (216)

质疑·补充·訂正

对《我所知道的陈誠》的质疑	毛嘯岑 (240)
对《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見聞》的补正	林志鈞 (242)
对《辛亥以后二十五年間貴州軍政概述》 的更正	黃乾堃 (243)
对《西北王胡宗南》的訂正	卢沛江 (245)
对《蔣经国与青年軍》的补正	高 梁 (246)

对《四川討賊軍的兴起和失敗》的质疑 唐仲殷 (246)

关于《張紹曾事迹回忆》的訂正 唐仲殷 (247)

对《文史資料选輯》第三十四輯所載

三稿的訂正 陆丹林 (249)

关于日本恢复元帅称号時間的訂正 王兆澄 (250)

关于庚子国耻紀念碑的变迁 沈茂林 (251)

对《曹錕賄选总统始末》的补正 罗介丘 (252)

关于楊杏佛被暗杀经过的訂正 楊小佛 (252)

“巡按使”不是清代的官名 吳范寰 (253)

对《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的补正 尹冰彦 (254)

《文史資料选輯》第三十七輯至第四十八輯

分类总目录 (261)

护国之役前后回忆

程 潜

(一)民国初年国内形势及党人在东京的活动

1913年討袁失敗后，国民党在长江、珠江流域各省的軍事政治力量，被袁世凱用铁棒手段摧毁无余。国民党的激进分子，如甯調元、仇亮、熊越山、蔣翊武、张振武、方維、楊德邻、伍任鈞、刘嵩衡等，被袁世凱残酷屠杀。国民党内一部分寡廉鮮耻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胡瑛、李燮和、洪承点、唐蟒之流，被袁世凱利誘收买，墮落成为袁世凱的爪牙。其余大多数的党员，因国民党地盘丧失和国会解散，隱藏于内地或上海租界。这当中有一部分人是暫避鋒鏑，暗中聚集力量，作卷土重来之計；有一部分人則是万念俱灰，从此匿迹銷声，不复过問政治。有一些党员，如陈炯明、朱执信、邓鏗、徐維揚、姚雨平、古应芬等，或借住港澳，或逃往南洋群島，依华侨为生，在华侨群众中寻找、发展革命力量。孙中山和黃克强，以及国民党内一部分骨干党员，如胡汉民、李烈鈞、柏文蔚、陈其美、居正、廖仲愷、許崇智、章士釗、鈕永建、程潜、周震麟、李根源、李书城、张孝准、方声涛、程子楷、林虎、冷遹、陈强、耿毅、邹魯、林修梅、林伯渠、易象、熊克武、楊庶堪、但懋辛、余际唐、何成濬、詹大悲等，先后逃往日本东京，过着流亡生活。1914年春間，各省議員如田桐、白逾桓、楊时杰、张知本、张继、覃振、謝持、王立斋等也因国会被解

散，在国内不得安生，先后亡命聚集东京。流亡东京的国民党員，在一敗塗地、創巨痛深之余，思想混乱，但大家都迫切要求总结經驗教訓，檢討得失，准备继续开展反袁革命斗争。

当时，黃克强和各省党員开过座談会，提出四个問題，請大家共同研究。这四个問題是：（1）国民党失敗的主要原因；（2）国民党何以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处于被动地位；（3）敌我两方形势的对比；（4）今后革命綱領和倒袁的策略。这四个問題，经过大家反复研究討論，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对于第一个問題，大家认为，国民党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組織不純，由同盟会改組为国民党后，紀律松弛，意志薄弱，党員行动自由，不受党的规范約束，大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因此，純洁党的組織，加强党内教育，維護党的紀律，是今后建党的重要原則。

对于第二个問題，大家认为，国民党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处于被动地位，是由于沒有掌握住可靠的軍事实力。同盟会白手起家，自来只是从事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主要革命活动多在会党和新軍里面进行。武昌首义后，两湖原有軍隊遭到黎元洪、譚延闓的百計摧殘，破坏无余；而当时响应武昌首义的各省軍隊，又多握于宪政派之手，同盟会无权調度支配。迫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和議告成、袁世凱的反动气焰节节高涨的时候，同盟会就只有处处被动、一味迁就了。

对于第三个問題，大家认为，現在革命形势正处于消沉时期，而袁世凱的反革命力量則囂張强大。袁世凱暴戾恣睢，所恃者两宗“法宝”：一是几个北洋陸軍師，二是一批貪官污吏、狐群狗党。但袁世凱这两股恶势力都是不得人心的，是不能持久的，革命力量是一定能够发展壮大的。

对于第四个問題，大家认为，在同盟会成立时，早有三民主义作为綱領。改組为国民党时，宋教仁主张迎合党内温和派的傾向，把政綱要求降低，使它和进步党的政綱相差无几，这是一个大錯誤。今后只有坚持三民主义的政綱，才能有效地組織一切反袁力量。至于倒袁策略，也应以三民主义政綱为举国倡，相机策动发难武力。

通过上面四个問題的討論，流亡东京的国民党党员的思想混乱状态，有了好轉。大家要求黃克强把討論中形成的結論拿去和孙中山商量，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时，国民党同志因逃难而来东京者絡繹不絕，人多，議論也杂。特别是对領袖人物的評價，开始发生紛歧意見。大家对孙中山手創民国，万流共仰，咸无間言；但是对黃克强，却有两派意見。一派认为，黃克强从事革命，赴湯蹈火，奋不顾身，宋案发生，以在野之身主持軍事，不計个人得失；湖口起义，馳赴南京，代替中山亲征，其爱护中山、保持領袖尊严的苦心，真是可白天地。南京軍事上的疲敝局势，不但黃克强无法挽回，就是孙中山也无法挽回，因此，苛責黃克强是不恰当的。另一派认为，南京各师都是黃克强留守任內組織起来的，宋案发生，黃克强又亲自負責指揮軍事，南京軍隊未战先潰，事前沒有周密准备，临事又轻弃基地，并且两次阻止孙中山出奇制胜的良謀，因此，贛宁之役南京方面的失敗，黃克强不能卸脫責任。稍微了解宋案发生前后的政治局势和敌我軍事力量对比情况的同志，都属于前一派，陈其美等則属于后一派。

有一回，陈其美和李烈鈞議論癸丑之役南京方面軍事失利的責任問題，陈其美意在言外地把責任通通推到黃克强身上，說党人沒有听从孙中山的意見，及早发难，致使失敗如此之速。李烈鈞坦

率地說：“国民党改組后，事权不一，癸丑之役失利，黃克強何能獨負其責？辛亥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時鬧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揚，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約束，这难道也要黃克強来負責嗎？”陳其美听到这番意含揶揄的話，气得目眦欲裂，怒髮上冲，但也只好吞声忍气，不加申辯而散。大家都知道，陳其美是一个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四捷”著名的小人，誰和他鬧翻，誰就要吃亏上当，誰就要預作安排，来应付他凭空制造出来的糾紛和无端挑惹起来的矛盾。如今他听到李烈鈞这么一番言論，知道一般軍人对黃克強怀有强烈的好感，他是不会善罢于休、中止其挑拨恶行的。

果然，事隔一周，黃克強就接到孙中山的手函，受到严厉的斥責。黃克強接到孙中山函后，感到晴天霹靂，目駭神惊，邀集我和李根源、張孝准、程子楷、冷遁、耿毅、陳強等談話。黃克強把孙中山的手函交給我們傳閱，神情泰然若素，說：“我从事革命，时时本着至誠，服从中山。去年南京失敗，我应完全負責。中山来信責備我，如此其重以周。信里讲的，有一部分合于当时事实，一部分与当时的事实有出入。我請各位同来，为的是商量一下，看如何处理好。”当时有人主張詳細申辯，分清是非，以息浮言。我认为茲事体大，不能莽撞处理，說：“中山大公无私，度量寬宏，生平对于同志厚道和气，这个手函措詞严厉，其中必有原因。自袁世凱用恶毒手段打击我党以来，我党已遭到严重失敗，現在亡命海外，只要稍具血性天良，就应当惩前毖后，痛自反省，吸取教訓，組織力量，与袁世凱作殊死斗争。我以为以有用的耳目心思，应注意于敌人的行动，党内應該精誠團結，才能發揮力量，战胜敌人。从前失敗，自然要认真检查，引为教訓。如认为中山說的是实，望你以有則改之自勵；如

认为中山說的不实，望你以无則加勉自勵。惟有不加申辯，然后可以息浮議，明是非，別有用心的挑撥伎倆也就不能得逞。”李根源說：“中山手函我也主张不作申辯。若加以申辯，則言論愈辯愈长，是非愈辯愈多。惟有不辯，則爭論无由而起。大敌当前，民党領袖尤应精誠团結，不予敌人可乘之隙。否則破綻一露，不独影响革命前途，且貽敌人訕笑。”黄克强十分兴奋地說：“我誠心誠意接受同志們的建議。”

自此以后，孙、黄感情和好如初。黄克强还和孙中山协商，請寺尾丰組織一所政法学校，收容和訓練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员。这所学校設在神田区，租有現成的讲堂。开学时，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萱野长知等一班日本人士，都来庆祝，犬养毅还作了讲演，黄克强也参加了开学典礼。政法学校的学生都是反袁的积极分子，以后在反袁斗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黄克强又和章士釗筹办了一个《甲寅杂志》，陈仲甫、李大釗、高一涵等纂著发梓政論。这时，許崇智銜中山命由热海来东京和我們联系，我們和他开誠布公地談論了两天，得出結論，一致拥护孙中山先生，实行三民主义，尽欢而別。随后，黄克强即偕李书城赴美游历。我們看到孙、黄关系不因小人挑撥而生齟齬，深为庆幸。

(二) 袁世凱称帝前的阴谋詭計

为了叙述护国斗争的方便，这里有必要稍为詳尽地談談窃国大盜袁世凱的滔天罪恶及其帝制自为的过程。

如前所說，袁世凱恃以暴戾恣睢的第一个“法宝”是反动的北洋軍队。癸丑之役和随后一段时期，袁世凱的軍事力量部署，除川、滇、黔、桂四省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李純率第六师占据江西；张勳

率辦子軍占据南京；倪嗣冲率安武軍占据安徽；龙济光率济軍，由惠州进攻广州，逐走了陈炯明；刘冠雄率海陆軍进入福州，吓走了孙道仁；湯薌銘率海陆軍各一部，查办湖南，撤換了譚延闓；曹錕率第三师扼据岳州，使黎元洪成为釜底之魚；楊善德率第四师扼据松嘉，使朱瑞成为甕中之鼈；最后任段祺瑞为湖北都督，調黎元洪入京安置于瀛台。川、滇、黔、桂四省，僻处偏陬，袁世凱的北洋軍隊有限，力所不及；且各省情况复杂，袁世凱虽想实现武力統一全国的迷梦，又势所不許。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自辛亥革命以后，地方各派小軍閥爭权夺利，傾軋割据，兵戎迭見，有如乱草蓬麻，非有較强的兵力和較长的時間，难望統一。云南虽然有一点軍事力量，但滇、黔两省本为进步党人的活动場所。湘人蔡锷在滇、黔两省的潜势力很大。此时湘人力拒北軍入湘，內閣总理熊希齡向袁世凱建議調蔡锷回湘接管軍民两政。袁世凱对蔡锷放心不下，乃作为贊成，先調蔡来京軟禁閑废，旋用貴州都督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任湯薌銘接替譚延闓督湘。至于黔、桂两省，此时只有一些沒有实力的地方部队，袁世凱鞭长莫及，只好先摆着，留待下一步来武力統一。計自1913年贛宁之役起，到这年年底，只有半年時間，袁世凱剿除革命势力步步成功，曾先后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李純为江西都督，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张勳为江苏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湯薌銘为湖南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鎮守使，段祺瑞为湖北都督。袁世凱凭借武力、篡窃民国、荼毒天下的阴谋，到这时，算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袁世凱的第二个“法宝”就是网罗了一大批寡廉鮮耻的官僚政客。这是一伙奔竞钻营、翻云复雨的社会蠹賊。他們攀龙附凤，为虎作倀，幻想袁世凱登上皇帝宝座后亦可飞黃騰达。袁世凱也就利

用这一批政治垃圾，导演了六幕天怒人怨的政治丑剧。結果，袁世凱作茧自縛，身敗名裂，而这一伙政治帮凶也遭到了历史的唾弃。

袁世凱的第一幕政治丑剧，就是騙取正式总统。国民党在第一次正式国会里的地位，在宋案发生前是独占优势的；宋案发生后，則是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优势反而让給进步党了。袁世凱想騙取民国正式总统的宝座，必須利用国会；要利用国会，必須利用在国会中轉居优势的进步党；要利用进步党，于是所謂“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的責任內閣——熊希齡內閣应运而生了。但是，按照临时約法是不能产生总统的，而此时宪法又沒有完成。怎么办呢？袁世凱及其党羽，利用当时一般人的糊涂心理，倡言必須速正名分，提前选举总统，取得外国正式承认，才能使国家免受外国瓜分。这就是先产生总统选举法，选出总统，然后产生宪法这种逆行法的由来。1913年10月6日，按照这种逆行法，在数千便衣軍警冒充“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之下，議會经过十四个钟头的三次投票，“选举”了袁世凱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总统。

袁世凱的第二幕政治丑剧，就是武力解散国民党，撤銷国民党的国会議員，破坏国会。袁世凱的总统宝座一到手，不出一月，即11月4日，就促使倪嗣冲、张勋、姜桂題等通电建議，以湖口之役为口实，以大总统经由国务总理副署的命令，解散北京国民党本部，取消国民党議員之資格，并派大批軍警围捕国民党議員。凡是自湖口动兵之日起，挂名于国民党的，都追繳議員证书徽章，共三百五十余人。但是两院犹足法定人数，可以开会，因又补行追繳八十余人，于是連在湖口之役以前脫党和跨党的国民党議員也都被追繳，共計四百三十八人。自此，国会便陷于不能开会的絕境。到1914年1月10日，宣布停止两院現有議員职务，国会遂行解体。

袁世凱的第三幕政治丑劇，就是組織所謂政治會議，一脚踢開熊希齡的責任內閣。政治會議由總統府派員十人、國務院派員四人、各部派員一人、各行省派員二人組成，並指定前清雲貴總督李經羲為議長。此時，熊希齡還在擬議廢省以固中央、謀求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他把這個“大政方針”提到政治會議上討論，立刻遭到揶揄反擊。1913年12月29日，政治會議研討了袁大總統提出的設立造法機關的建議（此即後來所謂“約法會議”），決定停止已失效用的國會的殘余議員的職務。至此，那個副署了種種命令（停止國會、停止省議會、停辦地方自治、特設造法機關）的熊內閣，對於袁世凱來說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但熊希齡老驥戀棧，袁世凱一翻臉，過河拆橋，便唆使黨羽，舉發熊前在熱河都統任內盜竊國寶案，把這位熊內閣搞得身敗名裂，他的以名流標榜的“第一流內閣”也就垮台了。

袁世凱的第四幕政治丑劇，就是成立約法會議。所謂約法會議，實即政治會議的兒子。約法會議的組成人員，京師四人，二十二行省各二人，蒙藏青海地區八人，全國商聯會四人。這些議員，都是袁世凱指派的御用官僚。約法會議於1914年2月18日開會，選出了一個變節的國民黨名士孫毓筠作議長，施愚為副議長。約法會議唯袁的意志是從，袁可曰可，袁否曰否。約法會議替袁世凱辦了兩件大事：一是於5月1日公布了“中華民國約法”，把總統的權力擴張到最大限度；一是8月18日通過了修正的總統選舉法。至此，袁世凱無論在形式上或事實上，都已經成了中華民國的獨裁元首。袁氏乃下令取消國務院，實行所謂“總統制”，派徐世昌為國務卿，各部部长由孫寶琦、朱啟鈐、段祺瑞、劉冠雄、章宗祥、梁敦彥、張謇、湯化龍等一班老官僚湊數擔任。

袁世凱的第五幕政治丑劇，是恢復滿清制度，推行復古運動。文官設卿、大夫、士三等九級，授徐世昌以下一批官僚上中下卿、上中下大夫等級官位。自新約法公布，袁世凱已成了事實上的皇帝，不久又發布了祀孔令，預備到了冬間還要祀天。黼袞法服，招搖過市，古香古色，眾目睽睽，嘆為未曾有的奇觀。到11月初間，北京的復辟風說，幾有“滿城風雨”之勢。

袁世凱的第六幕政治丑劇，是廢督整軍，虛省重道，加強中央軍政集權。從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在南北和議中，在抵制南往就職臨時總統中，在對付民國二年反袁戰爭中，在毀約法、解散國民黨、扼殺國會的倒行逆施中，處處時時都依靠北洋軍隊這副“撒手鐮”，夤緣時會，取巧投機，侥幸得到一時的“成功”。但也就在這個時期，袁世凱這個軍閥大頭領統馭下的各派中小軍閥的勢力，隨著膨脹壯大。在袁世凱看來，這些對自己效過忠、立過功的各地軍閥勢力的崛起壯大，將會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藩鎮割據，這是附骨之疽，勢必危及自身安全。因此，袁世凱就着手廢督整軍，虛省重道，削弱地方的軍權政權。袁世凱把都督改為將軍，只說廢督整軍，而不說裁軍，這是免得北洋老粗們見疑而心生變異。把各省民政長改為巡按使，削弱他們的職權，減輕他們的任務，實者虛之。把觀察使改為道尹，加重他們的權限和責任，虛者實之。這些措施，統限于1914年6月底完成。從此全國的軍政大權，就統一于獨夫袁氏之手了。

袁世凱的六幕政治丑劇，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登上皇帝寶座。在袁世凱依恃兩宗“法寶”導演六幕政治丑劇期間，除了遭遇白狼在河南一次聲勢壯大的事變外，可以說是得心應手、暢行無阻的。到了這時，袁世凱改元登極的事項籌備就緒，這位“真命天子”就要

临朝了。但是，历史是这样残酷无情，国内各派反对帝制力量的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破灭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这时候的皇帝梦正在高潮时刻，他继承大汉奸李鸿章的衣钵，采取所谓“以夷制夷”的两面政策，牺牲国家的领土主权，企求暂时的苟全，以达到登上皇帝宝座的野心。袁世凯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他既与英国亲善，又与德国交好，因此，协约国和同盟国两方，当时都可以在北京作对等的外交活动。其实，在帝国主义真刀真枪、兵戎相见的时候，腐败无能的袁政府想保持中立，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其它帝国主义者在欧洲忙于战争、无力东顾的时候，首先就给了袁政府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这时正是大隈重信内阁执政，以参加协约国为名，要求“继承”德国在胶州的权利。8月23日，日本用海军掩护，派广岛第五师团为主力在龙口及莱州登陆，占领潍县，控制胶济全线，包围胶州湾，战争七十余日，于11月7日攻下了青岛，随后又扩大其势力及山东全境。

日本政府兴师动众，侵占胶州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它的胃口大得很，想趁机吞并中国，独霸东亚。大隈重信看穿了袁世凯心中的秘密，屡次表示，如果袁世凯称帝，属于中国内政问题，日本政府决不干预，只要求袁世凯能够顺应国内外情势，忠诚与日本合作，达到“日中共同繁荣，彼此皆大吉利”的目的。有人或问：大隈重信为什么怂恿和支持袁世凯称帝呢？这是因为大隈重信看准了，袁世凯要称帝，日本就可以借此机会对他进行要挟讹诈，狠狠地敲一笔竹杠，果然于1915年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另一方面，袁世凯称帝，中国内部一定陷于长期混乱，日本正好趁火打劫，肆行侵略。

(三)反对袁世凱称帝的准备工作

在袁世凱酝酿帝制的时候，中国国民党的主要人物，都冲破了袁世凱的通緝网罗，作为政治亡命者侨集于日本东京。这时，孙中山先生改組国民党，定名称为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在新党尚未宣布成立，就以青帮首領身份窃据組織部門要津，我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在此时期，孙中山先生曾派居正、覃振對我們說明入党必須捺指印的意义，希望我們尽弃前嫌，参加中华革命党，共同奋斗。我們表示对孙中山先生忠誠拥护，但不願与帮会合作，現在即不入党，也不会另立名目，妨碍革命的进行，請居、覃将这层意思轉陈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明白了我們的意旨，也沒有勉强要我們加入中华革命党。

当时我們在东京有一部分同志，每星期都举行談話会，分作四个題目，来研究国内情势和革命进行方針。第一、主义。我們认定，無論革命或建設，都必須有主义以为指导。如果沒有主义，不但不能打倒袁世凱，就算打倒了袁世凱，也不能建設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我們认为三民主义，較之西方的民主議會政党政治，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能把中国建設为富强之邦。第二、量敌。我們认定，当前主要的敌人是万恶滔天的袁世凱，而袁世凱則有四种恶势力作为他的羽翼：一是北洋軍隊盘踞要津；二是反动官僚遍布全国；三是土豪恶霸橫行乡里；四是会党游民弥漫当道。这四种恶势力长期以来流毒社会，魚肉人民，我們和袁世凱作斗争，必須斬草除根，把这些恶势力消灭尽淨。第三、党派。我們认定，进步党是一个政治危险性最大的政治集团。它是前清立宪派的化身，主张改良，反对革

命，所以甘为独裁者所籠絡利用，拚命和国民党作对。袁世凱毀約解散国会，把进步党抛在一边，但是这个投机取巧、复雨翻云的政治集团，只要有机可乘，他們就会不擇手段地出現在政治舞台上，肆行爭夺。因此在反袁斗争中，我們要注意进步党的动向。第四、宣传。我們认定，必須向全国广泛宣传，造成强大的輿論压力，才能取得反袁斗争的胜利。

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我們为了对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詳尽的探討，组织了一个欧事研究会。为什么要取名为欧事研究会？对于这个名称，我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下来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想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来可以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誤会；二来可以借此聯絡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互相商榷；三来不怎么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聯絡，互通声气。

在欧事研究会成立之前，侨居日本的同志，如李根源、鈕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等二十八人，曾联名发出了一个停止內爭、一致对外的通电。在通电宣言上署名的，大体上就是后来欧事研究会的成員。通电宣言是章士釗起草的（見《甲寅杂志》），略謂：我們秉着爱国天良，反对独裁之志，始終不渝，即使在外患凭陵的时期，我們对袁世凱也不作絲毫让步，不存絲毫幻想；但我們主张停止內爭，一致对外，首先是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紧逼的侵略。这个通电得到了許多人的同情，也招致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誤解。自浅识者觀之，以为我們声称停止內爭，对袁世凱表白心迹，一定有所企图。自袁世凱觀之，我們的通电宣言，无异給他的通敌卖国、帝制自为，又增加了一层障碍。袁世凱痛恨之余，就賊喊捉賊地誣蔑我們，說我們是“借寇自重”。帝制运动公开化之后，欧事研究会的